

在复兴西路的寓所里，寄明翻看还带着油墨香的剧本。对儿童歌曲创作多一份母亲情怀的寄明，那天他向丈夫瞿维商讨该如何写？为了让主题歌能真正反映影片所依据的事实和片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变化，瞿维建议寄明到实地采风，丰富素材。一向对深入生活十分重视的寄明，马上采纳了瞿维的意见，从上海专门来到厦门。她寻找到那些已经升入初中的“支前小英雄”们，听他们讲述当时冒着炮火上阵地，解救将军送饭、送开水的英勇故事。新中国少年儿童身上那种为实现革命先辈理想，愿意无私奉献自己一切的纯洁而崇高的心灵，真的把她打动了，她时刻在寻找最能体现影片主题的旋律。

采风快结束了，一个热情奔放节奏和起伏度较大的曲调在寄明耳边萦绕，她连忙挥笔直书，《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初稿一气呵成。寄明高兴地带着它回到家中，马上哼唱给孩子们听。孩子们一边学唱，一边说好听。寄明并不满足，反复修改后，最终才定了稿。

1961年，电影《英雄小八路》上映，片中主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其鲜明、朝气蓬勃的音乐形象，受到少年儿童的喜爱。这个为新中国少年儿童抒发内心誓言和远大抱负的歌声很快离开电影不远而走，传唱在大街小巷，飞扬在祖国大地。1978年，此歌荣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同年，共青团中央在征求群众和专家的意见后，将《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正式确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才女患重病，抗争见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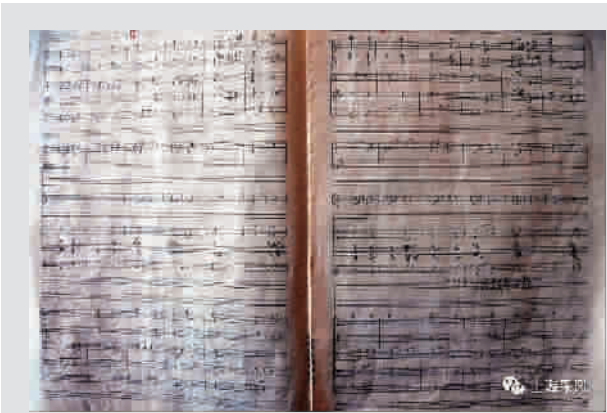
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才女，一个享誉乐坛的作曲大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竟会患上阿尔茨海默

症。这天，寄明上街，走到淮海中路时忽地迷失了方向，终于昏倒在路旁。幸被一位熟人发现，送她回到家中。经检查，被诊断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瞿维心中的难过是可以想象的。他四处奔走，百般求医。可是病情不见好转，却日益严重。寄明渐渐地变得什么都不明白了。后来不能走路了，瞿维扶着她每天早晚外出散步。渐渐这也不行了，瞿维就轻轻地搂着寄明在家里散步，仿佛在走慢步舞。瞿维嘴里不停地哼着伴唱：寄-明-同-志-叮-格-咚-咚，寄-明-同-志-叮-格-咚……此时的寄明脸上显出安详的微笑。可后来，她连听觉、语言能力也完全丧失了。到1991年，她就像婴儿一样，完全要别人护理了。

瞿维和寄明开始共同向命运作抗争，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页。每天一早，瞿维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到妻子床边，捧着她的脸拍拍她的双颊，亲亲她。他轻轻抱起她，放在一张为她特制的椅子上，为她洗脸，用柔软的小毛巾为她擦洗口腔，由阿姨捧着寄明的头使她稍稍后仰，瞿维便往她口中喂牛奶或酸奶，有时喂蒸鸡蛋。中午和晚上，瞿维亲自把鱼和肉、蔬菜、水果咬碎，分别装进小小的杯里，放进冰箱，餐前拿出蒸热，再给妻子喂食。丈夫就是用这

瞿维与寄明：作曲伉俪百年(下)

◆ 马信芳



无日不动笔，圆满音乐梦

对青年一代的音乐教育，是瞿维晚年一直关心的问题。他不顾年事已高和社会工作繁重，在1981年8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音乐研究室时欣然应邀担任教授和主任，满怀激情地为交通大学的音乐教育，为国家培养复合型人才献计献

策，发挥余热。

这个消息让高等教育工作者们欣喜如狂，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享誉海内外的音乐家会走进校园与他们共同奋斗。于是，1984年，全国理工大学音乐教育经验交流会召开之际，瞿维被应邀参加。这次会议决定成立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大家一致推举瞿维担任筹备小组的组长。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音乐教育学会成立，毫无悬念，他被推举为理事长。1988年国家教委创办《中国音乐教育杂志》，他又被任命为主编（后为顾问）。瞿维不是空头的主编和顾问，他为高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和社会普及性的音乐教育，撰写和组织了不少文章。他关心群众的音乐生活，不断出席群众性的歌咏活动和文艺演出，毫无保留地给群众团体的音乐演出作指导，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我曾问过瞿维先生，你早就离休了，八十多高龄的你该歇歇了。可

瞿维先生却笑答道：“贝多芬说过，我的箴言始终是：无日不动笔；如果我有时让艺术之神瞌睡，也只为要使它醒后更兴奋。乐圣的话说得真好！真的，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好像一天没有音乐，我就活不了。”

没想到，一语成谶。2002年，为音乐出版社的成书出版，瞿维要将《白毛女》歌剧的音乐部分进行新的管弦乐配器。为避免干扰，他来到他的老家常州，寻找了个清静的地方开始工作。5月20日，他上午还扒在总谱上工作，当天却发生了大面积脑溢血。经医生抢救无效，不幸于19时40分在常州逝世，终年85岁。

瞿维生前对自己的子女留下过遗愿，要把音乐遗产捐赠给他长期工作和奋斗过的上海交响乐团。瞿维子女尊重父亲的遗愿，已前后三次捐赠了父亲瞿维的创作手稿、乐谱、书籍和唱片等多年来他珍藏的音乐资料。

瞿维的好友、作曲家和音乐活动家孟波先生生前总结我国的音乐创作时说：“西欧的交响音乐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对我国现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和有益的影响，但即使是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曲家的作品，也是由于作曲家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彼时彼地的人民思想感情，并与音乐形象的表现相似，表现手法(旋律、节奏、调式、和声、配器及其它方面)的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结果。”

瞿维和寄明实践了以中国民族风格反映民族精神的思想，创作出人民大众欢迎的作品。这是我们时代所孕育出的优秀的艺术成果。穿越百年岁月，歌剧《白毛女》《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它们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更难忘的是他们在神州大地上谱写中华华美乐章时的澎湃激情。

摘自《上海采风》2017年第3期

玄机无界



达世新

14.光头大师

“我本名叫施道环，周围人都爱叫我大施，大师，叫起来方便，我听起来耳顺。”

认真的忻飞却不免追问道：“你姓施，为什么不叫你老施啊？”这光头的眼珠往上翻了翻：“这老施听起来像学校里的老师，我又没干过那个，本人是空军机械师出身，技术超一流，自然就叫我大师了！”

嘿，这回答令忻飞和尤子奇再度惊喜。“幸会幸会！”尤子奇伸手与大师紧紧握手。这人为他的这次来华采访可多了个重要线索。

他们接着聊开了，又一同向外面走去。听说忻飞毕业于西工大，光头大师揉了揉鼻子：“你们那学校航空专业的底子好，早先哈军工停办时，把整个空军工程系都搬过去了。”“呵，你对我们学校好熟悉！”忻飞不由对光头大师倍感亲切。大师看到路边有个茶馆，当即热情招呼两人进去，三人在小包间里盘腿坐下来，叫了一壶普洱茶又要了些花生瓜子。

“我刚才看你正在冯如墓上心是很诚的。不过呢关键还是要有成果出来，才能告慰他。”大师一语中的。“是啊是啊。”尤子奇为了挖到采访线索也忙敲边鼓。

就像石头给火烤得时间长了也会发烫一样，年轻人忻飞正是在左右两位好心人的夹击下，情绪上来了。他从背包里抽出手提电脑：“我这就来让你们看看我们做的新东西。”忻飞以极快的手法打了密码和动作口令。屏幕闪烁了一下，出现了一段视频：一架无人机在江边的绿化带上空上下翻飞着，突然间，它凌空做了几个直角转弯，画了个清晰而无形的五角星。尤子奇和光头大师都看清了，如此敏捷的秘密就在于这架无人机的翅膀可做多样变化，像是个可上天的魔方，又好似真实版的变形金刚！

“我还想把它做成一种特别的空天飞机。”忻飞激情难抑地说。大师往上吐着烟圈：“我只是有些担心你的研制条件不够啊。你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帮你。我们机械师被称作什么

知道吗？是‘托举战鹰上天的人’，是‘天梯’！我可接触过一些了不得的飞行技术。”他左右看了看，“你们知道美国空军的先进技术是从哪儿来的吗？”忻飞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一个是从德国搜罗到的，这个你们应该知道吧，1944年，美国组建了一支科学家队伍，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大科学家钱学森。他们跟随盟军队伍进入德国搜集了不少重要技术。另一个方面就是外星人技术。”尤子奇则咧嘴哈哈笑了：“不就是传说的飞碟吗？”“嘿嘿，尤老弟，你们知道外星人最多在哪里出现吗？我当兵时在世界屋脊呆过好几年……”大师正要往下说，突然尤子奇的手机响了。

电话是钟波达打来的，着急地询问“截到”忻飞没有？“找到了，找到了，正在谈外星人，待会儿我打电话给你。”光头大师警觉地瞥了他一眼：“我说到哪儿了？噢，当年我在西藏当机械员，主要是维护歼-7飞机。那时候，我从过往的僧侣和农牧民中多次听到了一些关于飞碟的传闻。”“传闻？”作为记者的尤子奇对字眼是很讲究的，“也就是听人家说的。”“不不。”他呷了一口茶。

光头不断喝茶的动作刺激了尤子奇先前就想小便的念头，起身道：“我上个厕所，等我来了再讲。”但待他从洗手间回来时，两人不见了，一张字条留在桌上：“不好意思，机械师提醒我，因您是记者，不便多谈机密，茶钱已付请慢用。”下面是忻飞的留名和电子邮箱。“哼！”尤子奇气不打一处来。

夕阳中的苏州河泛着炫目的金光。林之风和梦韵站在西藏路桥上，远远眺望。这几天林之风回想发掘出与那年轻研究生交谈中的线索来到此地，因为研究生好像对这一带很熟悉。过桥时，迎面响起一个声音：“嗨！姚梦韵，你怎么到这儿来啦？”梦韵和林之风都不由停下脚步。叫声是来自右前方一个抱纸箱子的年轻人。这人头发黄黄的、竖竖的，显然喷了摩丝。

“呀，是唐老鸭啊！”梦韵紧走两步：“你不是分配去山西煤炭研究院了么？怎么跑到上海来了？出差啊？”“出差？”那黄头发年轻人笑笑，同时迅速地打量了一眼林之风，“也算出差吧，不过车旅费都掏自个儿腰包。哎，你还没给我介绍过你身旁的这位咧，他是你老师，还是你的上海叔叔？”

28.参加高考

父亲是带着我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剪贴本，冒着7月里的毒日头，拖着中风后尚未痊愈的身子一瘸一拐地倒了三部公交车去的。不料这位营教导员外出公干了。父亲一连去了三天，天天坐等到当日的夜半时分才疲惫不堪地回家。最后一天总算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看了我的见报作品，又详细问了我的情况，说，我们会通过有关工业局进行政审以后再通知他本人的。

一切均发生得那样突兀那样令人措手不及。有一天清晨，当我做完最后一个大夜班，去楼上沐浴间冲洗完毕去食堂用过早饭以后，悠悠悠准时在早上6点钟下班走出厂门口的时候，突然被门房间门卫叫住了，他把一份通知递给了我，连连对我说不不好意思，又说是厂里头头关照等我夜班做出放班时交给我，关键是不能影响厂子里的“抓革命，促生产”。我接过通知一看，呵呵，要命了，当天上午8点整——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后，请我参加上海戏剧学院在轻工业局会议室举行的戏剧文学专业书面考试！怎一个“晕”字了得！但正因为如此，走进四川中路33号轻工业局会议室的时候，我可算是第一位报到的好学生。

上午考试的课目是文化知识，内容忘了，早已还给了那间会议室。下午的考试至今记忆犹新。老师在墙上挂出了一幅宣传画，名曰《鱼水情》：墙边摆放着一溜排的军用跑鞋，对面地铺上是一排入睡的解放军战士；灶台旁，一位小女孩在全神贯注地往军用水壶里灌水，身后门帘低垂……

考试的要求是，用散文或诗配图作文。尽管连着做了六个大夜班，尽管被文化知识的考试折腾了一上午，但心中的创作激情还是汹汹澎湃的，因为这是久违了的高考呵！在考试时时间快到点的时候，我居然涂鸦出了一首叙事诗——这可是小说与诗的连体结晶呵，心中别提那个有多得意了！于是十分自豪地抬起头来向那幅宣传画瞪了一眼，忽然就傻大叉似的定格在那儿一动不能动了！天哪，我怎么会犯下了一个如此致命如此低级的错误——夜班综合征的头昏脑胀加头晕眼花，竟然将影影

绰绰勾绘在门帘后面一位提着热水瓶的老大娘给看走了眼，漏掉了，没有了……要改，要彻底修改！可是，监考老师收卷了！我慌忙向老师说明原委，老师只是笑笑，说，我们会从你的文章中看出你的文学水平的……呜呼，我考砸了，理所当然地考砸了……这是1972年的夏天。一个苍白着脸的季节。

大学梦的延续故事发生在6年之后，1978年夏，重操旧业报考戏剧学院，而且来了个双料头——上海戏剧学院和中央戏剧学院一起考！其实中间却有个讲究：上戏复试的日期和中戏初试的日期重叠，均在同一天。私下里的小算盘是，若能参加上戏的复试，就放弃中戏的初试。报考的当然是同一个系：戏剧文学系。

那时候，我和袁诗人王小平等人人天天一下班就聚在一起复习得不亦乐乎，不到夜半三更决不回家！什么古希腊三大悲剧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什么古希腊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什么莎士比亚易卜生歌德席勒曹禺郭沫若等等，依稀记得，袁诗人还制作了很多小卡片，颇有做学问的腔调，而我，却差劲得很，统统记在了一册练习簿上。

领取准考证的要求很简单却有效：请把你发表的作品挂号寄来，审核合格便奉上准考证。于是，我很快收到了这两家大学的准考证。不，中戏寄给我的信封上印制的红色字体极为黑色幽默，赫然示：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背面印着地址：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大跃进路三条；准考证编号为2095。不料，好学的袁诗人却被拦在了门外，因为他是422代训的，要四川单位出证明，这简直是要命的事体，最后连准考证也没拿到。

我考上戏的成绩应该还可以，进入了复试的大名单。但听监考的老师说，人数太多，估计还要刷掉一些。当时因结婚已经调房搬到了弄堂里了，一位邻居大姐听说了我考上戏，自告奋勇地去找她那在上戏做老师的亲戚帮忙打听。隔了一天，消息来了，说我被拿下了，理由是我已结婚。

管新生

工人新村

